

特大制售假发票团伙覆灭的背后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要不要发票?”
在科技市场内、火车站广场、大型商场周围等处,倘若你从那里经过,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是抱孩子的妇女,向过行人轻声“叫卖”。
事实上,兜售假发票不限于此。
在停车场甚至是车辆等红绿灯的间隙,有人会在车窗内塞进代开发票的卡片;有时候,代开发票或便宜销售发票的短信会“不期而遇”;在电子邮箱里,我们有时候也会收到来自省内外的代开发票或便宜销售发票的邮件……

直击案件: 数起特大假发票团伙落网

案件一:去年5月13日,管城区地税局和管城区公安局经过周密部署,协同行动,果断出击,一举端掉了“一个长期贩卖假发票的特大窝点”。
这次突击行动是在稽查人员经过近一年半的摸排侦查和跟踪取证,充分掌握发票违法犯罪嫌疑人违法证据的基础上展开的。共派出稽查人员、票管人员和公安经济案件侦查员45人,出动车辆9台,拘留假发票违法犯罪嫌疑人4名。行动中,侦办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搜查了包括违法分子住所在内的三处假发票存放地点,分别从违法分子东三马路家中位于后阜里里、砖牌坊街的两处仓库,起获了大量假发票。
经过初步分类整理统计,发票涉及范围包括河南省(除濮阳市外)的所有地区以及湖北省和贵州省;涉及行业包括工业、商业、机动车销售、医药销售、文化体育业、服务业、娱乐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种类包括手工和定



额发票。现场还查获私刻发票专用章60枚。初步确定共查获各类假发票15326本,766300份,涉及金额180.6亿元,涉及税额8.13亿元。
据测算,该批假发票一旦流入社会,仅流转税就将造成约5.5亿元的税收损失,若再算上所得税,对税收的影响将超过15亿元。
案件二:去年5月28日,根据举报线索,金水区税源办、金水区打击涉税犯罪协调办公室联合市国税局、金水区国税局、金水区国税稽查局和金水区公安经侦大队,经过周密部署、缜密摸排,从在街头兜售假发票的涉案人员人手,逐步锁定贩卖假发票涉案人员。5月28日下午,专案组展开突击行动,在郑州市某住宅小区内的一个出租屋中,起获各类假发票共计13030份,打码机芯1个,伪造印章33枚,涉案金额达25.38亿元,抓获嫌疑人6名。
此次起获假发票中的大量假完税凭证和假增值税发票为金水区乃至省内首次发现,由于完税凭证和增值税发票为机打票且无金额限制,如果该批假完税凭证和假增值税发票流向社会,将会对国家正常税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案件三:去年8月24日,市地税局稽查局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联合开展代号“烈日”的专案行动,成功打掉一个涉嫌非法制售假发票特大犯罪团伙。去年6月,通过对一名贩卖假发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深挖细查,一个以周某、田某为首的制售假发票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为了一举打掉这一制售假发票犯罪团伙,确保打击成效,稽查局联合经侦支队、惠济区公安分局共同展开行动,代号“烈日”。专案行动组对此次专项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紧紧抓住以周某、田某出售假发票为主线,以端窝点为主要目的,以福彩路恒升府邸小区窝点为主,兼顾其他窝点,“全面多点”统一行动,强调寻找战机对涉案人员现场抓捕,力争全面收网,彻底摧毁该发票违法犯罪团伙。
经过统计,此次行动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2名,刑事拘留14人,治安处罚2人,捣毁

非法制售假发票窝点7个,收缴假印章150余枚,收缴假完税证241份,收缴假发票近1.2万份。其中,地税假发票7916份,包括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服务业发票、建筑业代开发票、建筑业自开发票、税控发票、公路内河运输发票、邮电通讯发票等7大类;国税假发票3800余份。据初步统计,假发票票面可开具金额近10亿元。另外还查获销售假发票卡片10万余张,电脑6台,打印机5台,群发器5台,汽车1部,手机50部,手机卡100余张。该案件成为我市开展打击假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以来刑事拘留人数最多的案件。
……

原因探析: 市场需求诱使犯罪团伙铤而走险

“尽管假发票违法犯罪行为非郑州独有,尽管税务联手重拳出击,初步遏制了假发票违法犯罪的势头,但可开金额能达到10亿元、25亿元,甚至达到180亿元、183亿元,这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倘若这些假发票流向市场,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巨大损失。”面对税务联手重拳打击取得的成绩,市地税局局长吕太昌没有一丝欣喜和轻松,反而多了一份震惊和沉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制售假发票的犯罪行为为何如此猖獗?

说实话,税务、公安打击制假、售假发票的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为什么假发票还这么多?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假发票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买方市场太大。
那么,假发票的市场在哪儿?无非就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取得假发票可以虚列成本费用,从而减少所得,偷逃企业所得税。第二,行政事业单位或企业取得假发票可以报销,从而获得不正当利益。

市国税局局长李和圈说,打击假发票,必须首先斩断买方市场,没有人买假发票了,卖假票的市场自然也就没有了。不过,这只是理想中的一个理想状态。

据介绍,自2007年开始,市国税局在全市房地产行业税收专项检查中,就开始从卖方市场入手打击假发票,积累了一定的打假经验。他们在辅导企业自查中明确提出,所有企业取得的发票在所得税前列支时一律要经过真伪鉴别,凡是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假发票一律剔除,不得税前列支。此次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部分企业的“使用假发票”行为。

去年,由市纪委牵头,市监察局、财政局、审计局、公安局、国税局、地税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发票报账环节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在审核报账凭证时要对

普通发票全部进行真伪查询。

郑东新区国税局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时候,郑东新区房地产企业开展了发票真伪鉴别活动,每份5000元以上的商业发票都要录入发票真伪查询系统进行比对。随后,经过国税局逐份核对发现,某房地产企业此前一年接受假发票竟有几百万元,而通过查询发现其接受的假发票金额为零。

通常情况下,单位报账发票,没有严格的真伪查询鉴别和鉴别结果处理这两道程序,按照《通知》的要求,全市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在取得相应入账的普通发票后,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真伪查询鉴别(正常发票必须加盖“鉴别正常”印章)——鉴别结果处理——正常发票领导签字——入账付款。

目前,此举正发挥着让报账人“取得发票必取真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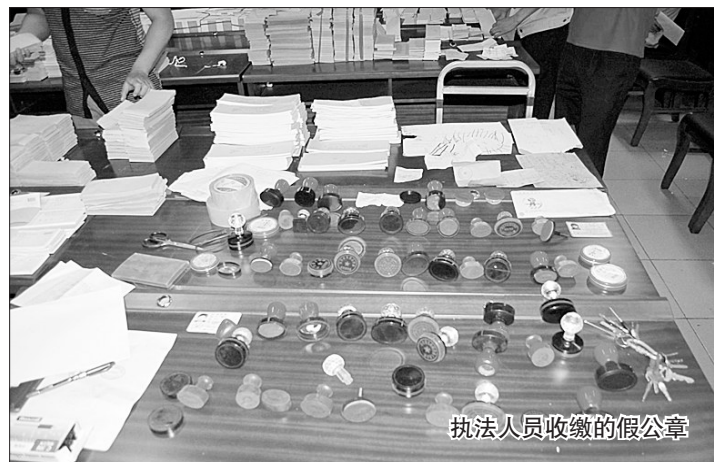
税务联手: 保持对发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如果说,切断买方市场是“一只手”的话,那么,保持对发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无疑是“另一只手”。

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宋山告诉记者,近年来,制售、使用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等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假发票几乎覆盖了国、地税的所有发票。尤其以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服务业、商业发票等普通发票居多,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代开发票违法信息、从事代开发票的团伙。

二是发票违法犯罪正趋向网络化、专业化。这类不法活动多已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网络,销售时以网络、手机短信、电子邮件、街头广告等形式推销假发票或招揽代开发票业务,也有些不法分子以虚假注册登记企业向税务机关套购骗取真发票非法代开。



三是制售假发票行为死灰复燃,屡禁不止。发票违法犯罪分子十分顽固,从以往查处情况看,家族式犯罪多,屡打屡犯的多,狡兔三窟的多,有的是一抓一窝,几乎全家都在干违法勾当;有的是今天被处理了,出来后又重操旧业;有的是这个点被端掉了,换个地方照样开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再难打,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市行政执法警察支队队长段树军语气坚定地表示:“发票违法犯罪危害很大,已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专门下发文件,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周密部署,要求严厉打击;虽然税务联手打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不敢丝毫懈怠,最近,我们又打掉几个犯罪团伙,正在进一步扩大战果。”

吕太昌、李和圈接受采访时均表示,打击发票违法犯罪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ynews.com

人,是城市街道景观整治的出发点

此一事情蹊跷。想一想,还是蹊跷。目前,重庆主城区正在大力进行主干道环境综合整治。究竟该如何整治?应达到什么效果?市建委已编制出台《重庆市主城区主干道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导则》,其中,《导则》对建筑立面整治提出要求,除要求建筑应改造成反映当地时代特征的景观外,开敞的阳台、露台要禁止堆放杂物、晾晒衣物。(5月24日《重庆晚报》)

街道是城市人行之处,也是人们的生活所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有市井味道,还弥散着一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就像没有相同的人一样,世界上亦无形象相同的街道,因而,千差万别的城市街道有着相异的文化性格。街道景观中有人活动的因素,同时包含诸多自然因素。长长短短的街道给人以直接的城市景观印象,赏心悦目或杂乱无章尽览于人的视觉。无疑,街道整治是城市景观整治范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沿街的建筑立面整治及构成街道景观整治的核心部分。建筑立面整治得漂亮、美观,对提升城市景观环境质量是件莫大的好事。

但是,由于城市街道景观功能与文化存在共生关系,因此,考量街道整治就不能脱离其中的人文因素。无论如何,人都是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沿街建筑立面整治,不能随意性太强,不能仅以景观形象为导向,要注重街道景观中人的聚会交往方式,要考虑街道景观中的公共生活特征,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性化,使之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阳台的用途,一般人都知道。它不就是房屋的主人可以选择小憩的地方或堆放杂物的建筑空间吗?禁止在阳台上堆放杂物晾晒衣服,是要逼屋主在厨房、客厅做这些事情吗?自家私人领地遭受侵犯,这也不能干,那也受限制,情何以堪,理何以堪。如此侵犯公众基本的生活权力,显现的是公权力不受制约后的一种乖戾,其符合法律吗?

城市街道景观整治,人应是出发点。街道景观是为人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以人为本,应体现在街道景观整治的每一个细节上,体现在舒适宜居、出行方便、生态完整上,可以说,这样的细节决定街道景观整治的成败。再好看的說法,再好听的名称,也不比民生重要,也不比居民们所关心的现实利益重要。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甚至于连中看也谈不上。禁止在阳台上堆放杂物晾晒衣服,说穿了,就是公权力的握有者为达成个人欲望而不惜侵害城市居民生活权利,打造彰显政绩的形象工程。就是瞎折腾。就是公权力做了不该管的事,将手伸得太长。因它品质不对,做法乖张,因它以牺牲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为代价,仅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还因它只顾及眼前,而不考虑长远,想来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无非就是轰轰烈烈一时,随之烟消云散。 今语

为何媒体越关注 跳楼越密集

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人民网5月25日)

看到这一消息,我真的不忍卒读。就在“第10跳”的舆论还在媒体发酵,公众对于“富士康能避免11连跳吗”的疑问刚刚发出之时,又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从富士康高高的楼顶陨落,这也是进入5月份以来的“第5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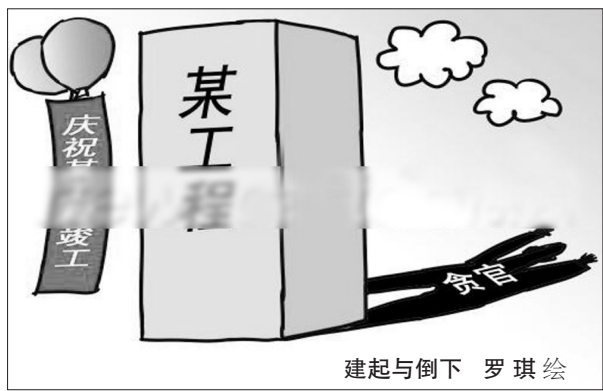
媒体越关注,跳楼越密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魔咒!让人不由想到法国电信员工连环自杀事件。据报道,从2008年到2009年,法国电信有35名员工自杀。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又有11人自杀。一系列发生在欧洲第三大电信公司的绝望行为,引起了全世界公众和研究者的关注。

有媒体总结出了连环自杀事件的一系列缘由:诸如法国电信对员工的管理办法野蛮,企业转型导致企业文化缺失;企业高层对员工们的不满情绪熟视无睹等,但一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屡屡关注,但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以至于“谈论得越多,就越会加重员工们的愤怒情绪”。

其实,关于富士康的问题媒体已经探讨了很多,这些原因和法国电信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情感护理、心灵抚慰系统的缺失”的指责,还是对“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执法部门懈怠”的不满等,各种议论虽然切中肯綮,但有一条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更何况,一连串跳楼事件的同时,每天仍有数千名年轻人的应聘者富士康门口排队等候面试的机会。

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虽然是一个是非之地,恶名远扬,为何还有不少员工仍然认为“富士康的用工还是比一般的企业要规范”,“待遇也不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去富士康,他们该去哪里就业,他们选择的机会又有多大?在一个整体缺少法治和道德支撑的市场大环境下,由于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各种违规、违法甚至血腥事件,较之富士康,许多企业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对于“富士康事件”,媒体报道时应保持负责任的克制。我们不奢望沉默的关注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行动,至少希望在目前阶段,别让如潮而又无结果的议论,一连串跳楼事件的同时,每天仍有数千名年轻人的应聘者富士康门口排队等候面试的机会。 彩云



稳定农产品价格迫在眉睫

绿豆、大蒜等小宗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发改委罕见地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切实做好各项稳定物价工作,并向低收入阶层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不可否认,近期导致物价走势严峻、通胀预期急升的主要因素并非整体物价走势的逆转,而是包括绿豆、大蒜等个别农产品价格的超常暴涨所致,民众担心,这些所谓的“小宗农产品”价格的疯涨将引发连锁效应,使本

来温和的通胀预期急转直下,演化成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恶性通胀。

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从本次大蒜、绿豆等价格暴涨数倍乃至百倍的成因看,除了今年的气候灾害等客观因素导致产量下降、供求不平衡之外,还有一些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其他因素:一是去年以来,宽松货币政策下强烈的通胀预期,正随着CPI的节节走高而演化成现实的通胀;二是生产成本的提高,也成为这些产品价格上扬的结构性因素。三是游资的恶性炒

作,绿豆、大蒜等小宗农产品不同于小麦等粮食,总体规模不大,盘子小,通过大资金的介入就可以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而近年来,包括国际游资在内的资金一直潜伏在大蒜、粗粮等农产品领域,利用中国低廉的价格大做文章,引发这些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内暴涨。

稳定小宗农产品价格的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不仅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关系到今年的总体物价水平,对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避免影响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光远

分配不公 仅仅是一个“问题线头”

5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谈收入分配。文章援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话说:“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大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而在此前一天,该报已刊登文章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则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值得关注的,是其实从5月17日起,《人民日报》已连续推出了“社会财富怎么分”的系列报道。

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0.5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像新华社所警告的那种“危险”,不得而知。至于杨宜勇先生断言的“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或许有着可以理解的遮蔽与游移。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何时候都可谓“正是时候”,只是那样一种“两条腿走路”的能力被一再地放弃了。以至于当收入差距的现实呈现眼前,我们已经很难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问题从诸多社会问题的纠结之中拎出来。我们看到,尽管笔调而浮浅,但《人民日报》也向我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问题背后的“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

这俨然已是中国的现实:在每一个问题的线头后面,都有着一个个关于整个社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线团。譬如权力的失控,权利的失衡,法治的失序,道德的失范等,“剪不断,理还乱”。这也深刻地表明,发展并不能天然地实现公平,有一种制度性的不公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必然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而更加尖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曾经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不由得想起历史上一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这是被马克·吐温命名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流行着粗鄙的实利主义和明显的政治腐败。“镀金”在意味着表面绚烂、繁荣的同时,也预示着浮华与衰败的开始。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那个时候美国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上升得非常快,甚至超越了当时的第一大英国。然而那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贫富最悬殊的年代。然后很快就迎来美国的大萧条了。菲利普斯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不只是几个烂苹果的问题(指丑闻公司),是整个果园都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现状,自然有别于美国的“镀金时代”。但如何在“正是时候”之际妥善解决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种种问题,却无疑是使社会最终免于动荡或萧条的巨大考验。我们看到,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国家正在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工资支付条例》等文件,我们期望,这样的努力能够最终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来呈现。必须从报上赋予体制舒展的灵魂,而不是局部的修补与堵漏。 老仁